



XIQU WENXIAN X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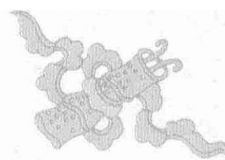
孙崇涛 / 著

戏曲 文献学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孙崇涛 / 著



戏曲 文献学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戏曲文献学/孙崇涛著.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8. 2

ISBN 978-7-5440-3262-9

I. 戏… II. 孙… III. 戏曲-文献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G257.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9692 号

戏曲文献学

责任编辑 薛海斌 孟绍勇

复 审 邓吉忠

终 审 张金柱

装帧设计 王耀斌

印装监制 贾永胜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印 刷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51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0-3262-9

定 价 (平装) 58.00 元 (精装) 73.00 元



自序

本书是本人从事戏曲文献学教学形成的一本教材。

1999年秋季起,我给自己指导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开设戏曲文献学专业课程,让硕士生学习戏曲目录学与版本学,博士生学习戏曲校勘学与编纂学,并结合授课内容,进行戏曲文献整理、校注的实践操作。授课期间,原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资料室全体同事,部分其他专业的在院研究生,在京及外地学校的个别研究生曾陆续列席旁听。

2001年,本人应聘赴任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系客座教授,该系开设中国戏曲文献学博士生在读课程,由本人承乏讲席。加州多所大学的中国学教员闻讯,不辞路途劳远,驱车前来旁听。回国之后,相继有哈佛、斯坦福等校做中国古代戏曲研究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专程来敝处私访,要求为其传授戏曲文献学专题功课。

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培训部戏曲专业研究生课程班,自2004年以来,均请本人讲授戏曲文献学课程,中国戏曲学院还将这门功课列为研究生各专业必修的三门学位基础课程之一。

我的这本教材,就是这样打鸭子上架,边教边摸索边积累起来的。另外,近年江苏、广东等省的许多高校同仁,也纷纷在为研究生开设戏曲文献学课程,并时与本人通信,磋商课程内容与授课方法。

以上事实,表明一种趋势:学习与研究中国戏曲文献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已越来越被人所认知,成为戏曲学习者、研究者与教学主事者等有识之士的一种共识。

事实也是如此。中国戏曲学,大而言之,系由戏曲理论、戏曲历史和戏曲文献学三个基本部分构成。三者关系,应是:“论”从“史”出,“史”从“文献”出;研究戏曲文献是最基础的层次,是一切真正从事戏曲研究所不可逾越的起步;舍弃了对戏曲文献的学习与研究,任何“史”、“论”,都将成为空中楼阁。学习戏曲学,一开始即问途“史”、“论”,好似无根之本、无源之水,结果必然会令学习者缺乏扎实基础与学养后劲,将来很难有自己的发现与创说,即使他们也可以著书作文,但大抵属于“炒冷饭”——拿别人的发现重新“制作”一番而已。

总结无数前辈学者的成功经验和自己多年从事戏曲研究、教学的切身体会,使我深刻领悟到,我们的戏曲学应该尽快建立起可与戏曲史学、戏曲理论学鼎足而立的“中国戏曲文献学”,归纳中国戏曲文献门类,评析戏曲文献遗产,阐述戏曲文献特征,总结戏曲文献收集、整理、鉴别、存储、使用、传布的方法与经验,整合中国戏曲学的完整体系,以推动中国戏曲研究与教学的顺利发展。于是不避鄙陋,



就将自己的授课讲稿，整理出版，期引他山攻错，共同促成中国戏曲文献学学科的早日完成。尽管拙撰是这方面头一本面世的概论性专书，却不敢自诩“填补空白”，只能说聊胜于无而已。

有关本书论述的戏曲文献对象，还需说明三点：一是散曲与戏曲关系密切，许多散曲家同时也是戏曲家，所以本书适当涉及部分散曲文献；二是编纂戏曲志也该属于戏曲文献学范畴，但鉴于目前全国这项工作已经基本暂告段落，故而不再涉及；三是笔者明知电子手段将成为未来戏曲文献重要的载体与传输渠道，但由于我们迄今还基本没有这方面的工作成果，经验无从总结，笔者也没有指导能力，只好有意回避付阙。总之，就戏曲文献学学科体系建设而言，本书出版还只能算是一个仓促而残缺的开头。为此，我要特别地感谢具有开拓意识的山西教育出版社的重视、支持和督促。

本书编写过程中，部分初稿有赖李季箴、吕文丽两位研究生的辛勤记录和整理；资料与图片提供，得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研究馆员刘效民女士的倾力帮助；部分附录材料，系由徐州教育学院吴敢教授惠赠。现借此特向各位深致谢意。

孙崇涛

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序于北京宁澹轩



目 录

自序	(1)
导论	(1)
一、引言	(1)
二、文献和文献学	(4)
三、建立戏曲文献学的意义	(7)
四、戏曲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与范畴	(19)
五、戏曲文献学研究的方法与途径	(21)

第一编 戏曲目录学

第一章 戏曲目录的作用与特点	(25)
一 什么是目录	(25)
二 目录在戏曲学中的重要作用	(27)
三 戏曲目录的特点	(28)
第二章 戏曲单科目录	(30)
一 宋金杂剧目录	(30)
二 元明杂剧目录	(35)
三 宋元明戏文目录	(56)
四 明清传奇目录	(59)
五 近现代地方戏目录	(64)
第三章 戏曲综合目录	(66)
一 简目型	(66)
二 提要型	(72)
第四章 藏家书目中的戏曲目录	(76)
一 百川书志	(76)
二 晁氏宝文堂书目	(79)
三 徐氏红雨楼书目	(80)
四 奕庆藏书楼书目	(81)
五 也是园藏书目	(82)
第五章 索引、简表及其他	(83)
一 索引	(83)
二 简表	(84)



三 其他	(85)
结束语	(87)
附 录	(89)
一 官本杂剧段数	(89)
二 院本名目	(91)
三 南词叙录所载戏文目	(97)
四 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	(98)
五 百川书志·外史	(101)
六 晁氏宝文堂书目·乐府	(103)

第二编 戏曲版本学

第一章 戏曲版本的特殊意义	(109)
一 版本与版本种类	(109)
二 戏曲版本流变的复杂性	(114)
三 戏曲版本涵义的特殊性	(117)
第二章 戏曲刻本流布	(121)
一 北京刻本	(121)
二 浙江刻本	(125)
三 江苏刻本	(130)
四 江西刻本	(144)
五 安徽刻本	(146)
六 闽广刻本	(148)
七 平水等其他各地刻本	(152)
八 自刻本	(155)
第三章 戏曲写本述要	(157)
一 戏曲写本种类	(157)
二 戏曲写本巡礼	(158)
三 戏曲写本利弊	(182)
第四章 戏曲版本鉴定	(184)
一 古籍装帧与版本术语	(184)
二 戏曲版本鉴定的方法与依据	(192)
三 善本戏曲的确定	(207)
结束语	(210)
附 录	(211)
一 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存目	(211)
二 复庄今乐府选存目	(217)



第三编 戏曲校勘学

第一章 戏曲校勘的任务	(249)
一 校勘的前提条件	(249)
二 戏曲校勘的目的和任务	(251)
第二章 戏曲校勘的基本方法	(261)
一 对校法	(261)
二 本校法	(263)
三 他校法	(264)
四 理校法	(266)
第三章 戏曲校勘体例	(269)
一 断句与标点	(269)
二 文字与校订	(270)
三 语汇与疏证	(272)
四 曲牌与曲律	(273)
五 科白与符号	(275)
六 场出与标题	(275)
七 阙脱与校补	(275)
八 错简与说明	(276)
九 其他注意事项	(276)
第四章 曲谱述略	(278)
一 北曲类	(278)
二 南曲类	(280)
三 南北曲合谱类	(285)
四 专腔类	(287)
结束语	(289)
附录	(290)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	(290)
二 简化字总表	(296)

第四编 戏曲编纂学

第一章 戏曲编纂分类叙录	(323)
一 汇编类	(323)
二 选编类	(334)
三 辑佚类	(334)
四 笺解类	(348)
五 校注类	(351)
六 综合类	(352)



第二章 戏曲编纂的基本原则	(354)
一 尊重原著, 力求存真	(354)
二 严谨科学, 精审翔实	(355)
三 面向读者, 便于取用	(356)
四 古今兼顾, 谨慎取舍	(358)
第三章 戏曲编纂体例	(360)
一 汇总与选辑	(360)
二 辑佚与辨析	(361)
三 提要与笺释	(364)
四 校勘与注解	(369)
五 句读与符号	(374)
六 目录与索引	(376)
七 附录与书目	(377)
八 前言与后记	(378)
第四章 戏曲编纂的专业工具书	(381)
一 字典、辞书类	(381)
二 百科、提要类	(382)
三 年谱、传略类	(382)
四 索引、综录类	(383)
五 地图、年表类	(383)
六 曲谱、曲律、曲韵类	(383)
七 剧目、辑佚类	(384)
八 国家标准与其他	(384)
结束语	(386)
附录	(38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古籍著录规则	(387)



导 论

一、引言

中国戏曲学，按其研究的内容和性质，可分为三大部分，即：戏曲文献、戏曲历史和戏曲理论。这三个方面，实际也代表了戏曲学的三个不同研究层次。至于戏曲志，应该属于戏曲文献学的分支。戏曲志是戏曲文献学向方志学的渗透，或者说是方志学向戏曲文献学的延伸。

上述戏曲学三个方面的关系，应是：“论”从“史”出，“史”从“文献”出。研究戏曲文献是最基础的层次，也是我们从事一切真正戏曲研究所不可逾越的起步。即使从事现、当代戏曲研究，也不应当例外。因为“现、当代”也会成为未来的“历史”；今日之现状，即是明日之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当代也属于广义的历史。故研究现、当代戏曲同样也得从基本文献研究出发。所不同的是，研究现、当代戏曲，除根据剧本、记载、评论等文字资料亦即书写文献之外，还需更多凭借戏曲舞台演出实际，或者记录舞台演出实际的录音、录像等手段，即依靠现代化的文献载体。总之，研究戏曲，寓目皆见文献，动辄接触文献，离开了文献研究，就谈不上是真正意义的戏曲研究。

中国戏曲学尤其是近现代戏曲史学的研究实践证明，凡是在这方面作出出色成绩的专家、学者，不管他有意识或无意识，几乎都是从整理、研究戏曲文献入手或起步。若谓不信，请看以下事实：

王国维是近代戏曲学的创始人，所著《宋元戏曲考》^①，被人们公认为近代戏曲史学的奠基之作，1913年完成。实际此书的完成，是建筑在作者先期进行大量戏曲文献研究工作的基础之上。1908年，王国维最先写成《曲录》六卷，对中国戏曲文献进行分类著录，将近三千个剧目和百余种曲书作了全面的逐一罗列。此后，1909年，王氏又著《戏曲考原》一卷、《录鬼簿校注》二卷、《优语录》一卷、《唐宋大曲考》一卷；1911年，作《古剧脚色考》一卷等。以上这些，都是戏曲文献研究工作。其中《曲录》、《录鬼簿校注》，是地地道道的戏曲文献专著，《唐宋大曲考》、《古剧脚色考》等，则是对戏曲文献进行专题研究、探讨的论著。有了以上这些戏曲文献研究的成果积累，王国维最终“乃以三月之力”，水到渠成，很快完成了《宋元戏曲考》的写作。

^①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初名《宋元戏曲史》，1913年初完成，最初以连载形式，分章刊于《东方杂志》（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九、第十卷（1913年4月至1914年3月），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单行本，列入《文艺丛刻·甲集》。



王季思是众所公认的现代元曲研究大家，也是所谓戏曲史学“新学院派”的奠基人和代表人物。他的元曲研究工作，是从《西厢五剧注》^①这一戏曲文献著述起步的。

20世纪30年代南戏研究三大家赵景深、钱南扬、冯沅君，他们的研究不约而同地从戏文辑佚工作入手。赵景深在戏曲史学研究方面影响较广的两本书，一是《元人杂剧钩沉》^②，该书把《元曲选》等所收单种杂剧之外散见各处的元杂剧片断残文加以收集和整理。另一本是《宋元戏文本事》^③，该书是近代最早出版的研究南戏的专书，它把散见各处的宋元戏文残曲进行汇编，编成十五段文章。赵氏此二书所作的都是文献搜集、整理、编述工作。钱南扬《宋元南戏百一录》^④，是一本较之《宋元戏文本事》搜罗更为宏富的戏文残曲的辑佚专书，书前的“总论”，是著者在辑佚工作基础上所作的总结，也是他后来写作一生带有总结、概括性的学术论著《戏文概论》的前身。冯沅君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南戏拾遗》（与陆侃如共同署名）^⑤，则是将当时发现的《南曲九宫正始》中保留的为钱、赵二书所未收的戏文佚曲材料加以汇辑，补充了钱、赵二人的辑佚工作。可见，20世纪30年代赵、钱、冯三家所作的中国南戏研究的筚路蓝缕工作都是文献研究工作。

孙楷第先生早年从事文献校勘、训诂工作，著有《韩非子校正》、《刘子新论校释》等书。他的古典戏曲研究名著《元曲家考略》^⑥，是汇集有关元代作家生平史料的文献考述工作。后来也是园藏明脉望馆钞校本杂剧发现，他又著《也是园古今杂剧考》^⑦这本阐释戏曲文献的著作。可见孙楷第先生的戏曲研究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于对戏曲文献的考释。

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⑧一书，具有很高学术价值，书中各文，都是作者在对中国古代戏曲文献进行认真梳理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看法，所以篇篇扎实，言不虚发，深得学人赞许。

周贻白先生一生从事戏曲史学研究，成就卓著，论著迭出。他同样也很看重戏曲文献研究和著述工作。所著《戏曲演唱论著辑释》^⑨，是把散见各处的有关中国古代戏曲演唱的论著文献加以汇辑、笺校和解释。他的《中国戏剧史长编》，实际是将自己掌握的全部中国戏曲史料文献，按照编史方式，悉数加以汇辑和串编，故称“长编”。

① 王季思：《西厢五剧注》，浙江龙溪龙吟书屋1944年印行。

② 赵景深：《元人杂剧钩沉》，初名《元人杂剧辑逸》，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初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增订本，并改用此书名。

③ 赵景深：《宋元戏文本事》，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初版。

④ 钱南扬：《宋元南戏百一录》，载北平《燕京学报》专刊之九，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印行；《戏文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初版。

⑤ 陆侃如、冯沅君：《南戏拾遗》，载北平《燕京学报》专刊之十三，哈佛燕京学社1936年印行。

⑥ 孙楷第：《元曲家考略》，上杂出版社1953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增订本。

⑦ 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初名《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刊1940年12月《北平图书馆》季刊，上杂出版社1953年出版增订本，并改用此书名。

⑧ 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中华书局1979年初版。

⑨ 周贻白：《戏曲演唱论著辑释》，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年初版。



日本青木正儿著《中国近世戏曲史》，意在补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所叙历史之不足。该书著述过程，也包含许多文献整理、研究工作。作者曾编有《中国戏曲书目提要》，后由王古鲁翻译、整理，附在《中国近世戏曲史》^①之后。此书目是一份戏曲文献编目，也可视作为作者编史的文献依据目录。《中国近世戏曲史》在叙史过程中，对其论及的每一种戏曲剧本都撰有剧情“梗概”。推想该书的写作程序，是先把每一剧本的内容提要写好，然后再加上自己的看法写成，其整个研究、写作过程，也体现为从基本文献研究入手的途径。

现、当代研究戏曲史学校有成绩的，还有任二北先生。其所著《优语集》^②，是记载优人言行的文献疏理、汇编、附释著作。所编《新曲苑》^③，是把古代有关戏曲的论著加以汇辑。二者都是文献编纂著作。所著长达80余万言的戏曲论著《唐戏弄》^④，资料翔实，于唐代戏剧史料搜集之丰富，他人莫及。作者声称，他著此书的目的之一，是“特向有志考源、从事考源者，介绍比两宋更提前三百四十年之种种实际资料”，就是为唐代戏剧研究者提供充足的文献依据。

目前还在辛勤笔耕的徐朔方先生，他的戏曲研究工作，是从校注《长生殿》、《牡丹亭》^⑤起步，继之撰《汤显祖年谱》，编《汤显祖集（诗文集）》^⑥，后来他又对晚明主要剧作家逐一编撰年谱，并著《汤显祖评传》^⑦，在做好这些文献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他现正在从事《明代文学史》的写作。纵观徐氏全部研究历程，也是从文献研究入手。

当然，中国近现代在戏曲史学研究方面作出卓有成绩的专家、学者还远不止上述几位，其他如：吴梅、郑振铎、齐如山、董康、卢前、马廉、阿英、傅惜华、杜颖陶、谭正璧、吴晓铃、郑骞等等诸家，他们同样都是十分重视并致力于戏曲文献的搜集、考订、整理和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丰硕而坚实的学术研究成果。

以上事实，无不证明一点：所有从事真正戏曲研究并取得成绩的人，向来都很看重戏曲文献，他们的研究程序，多从最基本的文献收集、整理和研究入手。可见做好这一基础工作、迈好这一起步的重要性。

戏曲文献在戏曲学中的位置如此重要，戏曲文献整理与研究在戏曲研究中处于入门和起步的地位，戏曲研究特别是近现代戏曲史学的实践经验又反复证明，从戏曲文献整

① [日] 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昭和五年（1930）成书，上海北新书局1933年初版郑震节译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王古鲁全译本，中华书局1954年重版王译增补修订本，作家出版社1958年重印译者修改版。

② 任二北编著：《优语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初版。

③ 任二北辑：《新曲苑》，中华书局1940年初版。

④ 任二北：《唐戏弄》，作家出版社1958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再版修订本，署名：任半塘。以下引文，见该书第4页“弁言”。

⑤ 徐朔方校注：《长生殿》，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初版；徐朔方、杨笑梅校注：《牡丹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

⑥ 徐朔方：《汤显祖年谱》，中华书局1958年初版；徐朔方笺校：《汤显祖集（诗文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初版。

⑦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初版；《汤显祖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初版。



理与研究入手,是我们顺利走向戏曲学术康庄大道的最佳起点。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却未曾明确提出“中国戏曲文献学”这一学科概念,更不见有关这方面的专门论著。人们只知不断地搜集、整理、刊布、管理、传输、使用各种戏曲文献,却忘却应该去研究、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与规律,努力建立中国戏曲学领域中可与已有相当学术建树的戏曲史学和戏曲理论鼎足而立的戏曲文献学。

戏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滞后现象,在呼唤我们:努力建立“戏曲文献学”,时不我待。笔者不揣浅陋,愿做“破题儿头一遭”,尝试著述这本《戏曲文献学》,希望抛砖引玉,引来更多、更好的后文。

二、文献和文献学

中国古代文献之丰富,用“汗牛充栋”还不足以形容。现存中国古籍文献,究竟有多少数量,精确数字,难以计算,只看以下三个基本数字,可见一斑:

(1) 丛书数。1959年,上海图书馆编写《中国丛书综录》,共收丛书2 797种,子目书名38 891种。所收均系古典文献,“新学”丛书不在所收之列。

(2) 没有编入丛书的单行本数。据孙殿起《贩书偶记》和《贩书偶记续编》,仅清人著作就约有16 000余种,清以前的未加统计,估计至少也应有10 000种,二者相加,是26 000种左右。

(3) 各种方志文献数。1978年,普查全国180多家图书馆收藏的方志文献,共计8 500余种。

以上三类,累计得75 000余种。这其中还不包括大量小说、唱本、释藏、道藏、谱牒、经史拓本以及民间戏曲等。故有人估计,目前我国古籍文献,保守毛估,约80 000多种,这还不计已经佚失和有待进一步发现的现有名目可稽的文献数量。

至于戏曲文献有多少,更是无法精确统计。《中国古籍总目·集部·曲类》(初稿),光据全国十来家主要图书馆所藏的“曲类”书目,累计得书目8 000余种,版本10 000余种。实际数量,不知要比这多出多少倍。例如20世纪60年代,对福建闽南地方戏剧剧目进行过调查、发掘、整理,光是“莆仙戏”一个剧种,就得抄本8 000多本、剧目5 000个左右。全国地方戏近四百个剧种,合计起来,剧目文献总量是非常惊人的。由此一点,也可反映“戏曲文献学”地位之重要及其研究任务之艰巨。

(一) 何谓“文献”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记孔子语:“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宋·朱熹《四书集注》对这段话的解释是:“杞,夏之后。宋,殷之后。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①其中对“文献”的定义是:“文,典籍也;献,贤也。”“贤”谓“贤者”、“贤才”,即指故旧耆老们的言论。《论语》中最早出现的“文献”概念,包括书本记载与贤才言论两层意思。古称“征文考献”,就是指了解历史,必须取证于书

^① 宋·朱熹:《四书集注》,《论语》卷之二,《八佾》第三。



本，探究故老的言论。所以，《辞海》释“文献”一词，说：“原指典籍与宿贤。”

历史上，最早以“文献”命名的著作是宋元之间人马端临（1254—1323）的《文献通考》。该书是继唐·杜佑《通典》之后又一部阐释古代典章制度的专书，凡三百四十八卷。在《文献通考·自叙》中，马端临对“文献”的解释，与《论语》基本一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简言之，“文”指书本记载，“献”谓学士名流议论。依据这个准则，《文献通考》的体例是：顶格写书本记载，就是“文”；低一格录名流议论，就是“献”。二者交相互用，充分体现“文”与“献”的依倚作用，使旧有的“文献”概念在著作中得以具体体现。

尽管《文献通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文献”命名的文献著作，实际此前早有不以“文献”命名的文献著述存在。例如：司马迁的《史记》，除记事之外，还收录不少前人言论与文辞。班固《汉书》，把有关学术、政治的重要论文都一一转载传中；其《艺文志》更是我们研究历史艺文的重要参考文献目录。更早的《尚书》，《典》叙事实，《谟》记言论。《左传》于记史实外，用“君子曰”抒发言论，二者连看，也是一种“文献”。甚至“六经”，也可视作“文献”。清代历史学家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卷一中说：“六经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颂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相传孔子赞《易》，修《春秋》，删《诗》、《书》，订《礼》、《乐》。在章氏看来，这些也不过是孔子依据周官旧典而作的文献考订工作，故而认为，“六经”虽作为经典，其实质还是文献著述。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与“作”是两个有所区别的概念：“述”是把前人已经说过的话，再加以重新表述；“作”是自己个人的创造和见解。孔子承认自己还只达到“述”的境界。《礼记·乐记篇》云：“作者之谓学，述者之谓明。”清·焦循《雕菰集》卷七《述难篇》云：“人未知而已先知、人未觉而已先觉，因以所先知先觉者教人，俾人皆知之觉之，而天下之知觉自我始，是为‘作’。已有知之觉之者，自我而损益之；或其意久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人，而作者之意复明，是之谓‘述’。”在古人看来，“述”与“作”是不同层次的工作，代表了不同的等次。但“述”是“作”的前提与基础；没有事先做好“述”，是不可能“作”的。这跟我们所说的“论”从“史”出、“史”从“文献”出的道理一致。

近现代的“文献”概念，已经发生改变。“文献”后来成为一切历史文件的泛称。故《辞海》在上文所引那句对“文献”一词诠释之后，补充说：“今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如历史文献。亦指某一学科有关的重要图书资料，如医学文献。”

近代，人们对“文献”概念曾有不同解释。有人认为，现代概念的文献，就是专指有一定历史或科学价值的文字材料，是记录人们从事实践活动的经验和知识的成果。它不应该包括没有文字记载的文物。这一提法，把“文献”与“文物”加以区别。“文献”的标准是必须要有文字记载，没有文字记载的文物，尽管也具有文献同等性质的价值，但不可径称为“文献”。另一个原则是，文献必须具有历史或科学价值，否则就不具备“文献”资格。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文献的载体在起着相应变化。以上这种仅限于“文字记载”的文献概念提法,现在看来还缺乏发展眼光。现在图书馆学者和情报学者把用文字、图画、符号、声频、视频等手段记载的资讯材料,包括图书、期刊、报纸、胶片、胶卷、录音带、唱片、照片、录像带、幻灯片、影片、计算机磁盘(硬盘、软盘、光盘、U盘)等等,全都纳入文献范畴。另外,还包括古代遗存的,如用甲骨、金石、竹简、木牍、碑铭、谱牒、拓片、帛书等载体记录下来的资料。现代意义的文献对象范围,已不可与旧时同日而语。

综上所述,现代社会的文献概念,简单地说,就是:具有一定历史或科学价值的,用文字及其他相应载体记录下来的资料。注意:这里必须强调“记录下来”四字,文献必须是提供后人有案可查、有据可考的资料,而非瞬间即逝的信息。

现代研究文献的人,还曾提出“文献”就是“情报”的主张,认为文献工作是“情报检索”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提法有它一定的合理性。袁翰青发表于1964年第2期《图书馆》杂志上的《现代文献工作基本概念》一文说:“文献中的知识单元实质上就是所含的情报。通常所谓文献工作实际有两个方面:知识组织工作的一方面和情报检索工作的一方面。……组织工作是体,检索工作是用。这体和用两个方面,构成文献工作的基本内容。”此说法强调了“知识组织”是文献工作的重要方面,体现了现代文献学的新任务,它对文献的组织利用,已不囿于文献资料的分类、编目、鉴定、校勘、典藏的旧文献学模式,而同时还注重文献产生、分布、交流、利用等规律的探讨,使文献学从静态特征研究转化为动态特征的研究,说法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有一些学者认为此说法也有它不合理的成分。如有学者认为:(1)文献是静止性的,而情报是动态性的,二者本质不一样;(2)文献是没有针对性的,什么人都可以利用,而情报使用是有针对性的;(3)文献是过去知识的记录、积累,而情报往往是即时性的,甚至是预测性的;(4)文献多用文字等专门载体记录,而情报还可以用其他实物作为载体,如气味、声音、脚印、手印等,都可以作为情报载体。故而文献不等于情报。

(二) 何谓“文献学”

文献学是专门研究如何正确管理和利用文献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是指点人们顺利通向文献宝库的门径,是帮助人们迅速打开文献关卡的一把钥匙。

在中国古代,没有“文献学”的概念,“文献学”是在近现代才产生的一门学科。尽管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从事文献收集、整理、研究工作,却长期忽略了对文献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和建设。据目前所知,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郑鹤声、郑鹤春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①,恐怕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的我国第一本“文献学”专门著述。可见“文献学”这一学科诞生之晚。在旧版《辞海》中,甚至连“文献学”的词条都没有。直至1982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文献学专家张舜徽先生著的《中国文献学》,扉页“内容提要”称它是“我国文献学领域的奠基性著作”,为时则更晚。

^① 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撰于1928年,商务印书馆1930年初版,1933年重印。之后,有上海书店1983年重印本,收入复旦大学、上海书店编辑的《民国丛书》第二编。近年有编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蓬莱阁丛书》的郑一奇“导读”本。



近代，人们对“文献学”的概念与研究范畴认识也很不一样。梁启超先生把“文献学”看成是“广义的史学”。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郑氏兄弟所著《中国文献学概要》，则持与传统说法相近的观点。此书《例言》引用《文献通考·叙》关于“文献”含义的解释之后，说：“本编亦采其谊。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定、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不过，这里实际也涉及古籍整理与研究中的目录学、版本学、编纂学、校勘学以及审定、翻译、讲习、印刻、分类、鉴定等手段。张舜徽先生认为，在古代，文献学即是校讎学的“别名”。张著《中国文献学》第一编《绪论》第一章《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中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讎学家。所以校讎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凡是有关整理、编纂、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都由校讎学家担负了起来。”^①按照张先生解释，传统概念的文献学，是指研究我国古代文献典籍的分类、目录、版本、校勘、辨伪、注释、编纂、印刷源流、整理等的一门学科。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记录文献的载体，传输文献的媒介，以及收集、鉴别、整理、管理文献的手段等，都发生了很多变化，文献学的研究对象、范畴与任务等，也应当有相应变化。譬如说：由从前的单纯文字文献研究对象，扩大到音像文献研究对象；从文献的静态特征研究，扩大到文献动态特征研究；从传统的公私库存文献研究，向现代化的互连文献、资讯共享的研究转化等等。

另外，文献学是一门综合学科，研究对象、范畴，包括诸多方面。文献学的发展势必要从综合文献学（或称“普通文献学”）中派生出许多分科文献学。如从学科性质来派生，便有历史文献学、经济文献学、宗教文献学、法律文献学、医学文献学、科技文献学、文学文献学等等。所有学科都可以建立起与它相应的分科文献学。今天我们要共同努力，去建立起我们的“戏曲文献学”。如从文献学学科范畴的部类来区分，过去把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编纂学等都一起归入综合文献学之中，随着文献学研究的发展与分工的细化，文献学各个部类便逐渐独立出来，分别成为单独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编纂学等，将来还可能派生出更多的其他别的分支学科，如专门进行有关电子载体文献的记录、检索、传输等研究的分支学科。

目前，文献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不断开展。许多大专院校中文系都设有文献学专业。某些部门和研究机构，常设有文献研究部门。戏曲文献学也开始进入国内外某些大学与研究机构的教學领域，如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培训部，近年都连续开设戏曲文献学必修课程，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系也曾将戏曲文献学列为博士生学位课程。以上一切，说明了戏曲文献学客观存在的必然性和实际任务的重要性。

三、建立戏曲文献学的意义

戏曲文献学是研究、总结如何更好地收集、鉴定、整理、保管、编校、解释以及准确使用戏曲文献的一门学科。建立这门学科，主要是出于以下三方面的需要：

^①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一) 出于戏曲研究的需要

建立戏曲文献学是为进一步引导人们对做好戏曲文献研究工作的重视,使人们更明确、更自觉地认识到充分掌握和准确使用戏曲文献与做好戏曲研究工作之间的关系至为密切。这些关系,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八个方面:

1. 文献对象错位,一切研究变成徒劳。

譬如,一位青年学生写了一篇研究元代杂剧演出状况的文章,而他所依据的剧本材料只是《元曲选》。这就是文献对象错位。因为《元曲选》是经过晚明臧晋叔改订后刊行的杂剧选本,它不能作为论证元代杂剧演出情况的第一手资料。荷兰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伊维德(Wilt L. Idema)先生,曾经发表过一篇英语写的文章,题为《我们读到的是“元”杂剧吗?——杂剧在明代宫廷的嬗变》^①。文章认为,元人杂剧作品大致经历三个演变阶段:(1)元代民间表演艺术阶段;(2)经删改、改编演出的明代宫廷娱乐阶段;(3)文人案头文学的晚明刊本阶段。我们现在所见的元杂剧作品,大多数是经过明代文人改编、编订亦即第三阶段的文学刊本,它与元代杂剧实际演出状况已相去甚远。伊文结论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依靠元代剧本来研究元杂剧”。既然如此,晚明编印的《元曲选》,就更不足以用作探讨元代杂剧演出实况的真实材料依据。伊文的这种思路是对的,因为二者确实不可等量齐观、同日而语。单凭晚明改本去描述元代杂剧演出情形,即使写成文章,也几乎等于徒劳。

一位韩国博士生,曾来信询问一个问题:元杂剧作家石君宝的籍贯究竟在哪里?是山西平阳,还是辽东盖州?这问题提得很有水平。因为,根据元·钟嗣成《录鬼簿》记载,石君宝,山西平阳人。可元代还另有一位辽东盖州石君宝。盖州石君宝复姓石璣,字君宝。女真氏族皆复姓,译为汉姓,改单姓,“石璣”改成“石”,即成“石君宝”。孙楷第《元曲家考略》曾经考证出这位盖州石君宝的详细生平行迹,但他也难以肯定他是否即是写杂剧的平阳人石君宝,只是作了“君宝之先,盖由盖州徙平阳”^②的推测,未作定论。如果不事先审定杂剧作家石君宝的身份、行迹,随便张冠李戴,将盖州石璣君宝的所有记载材料随便坐实给平阳石君宝,等到论文写完了,才发现两者根本不是同一人,岂不是对象错位、白费力气?故文献对象切切不可错位,这位韩国博士生懂得这个道理。

还有一个更为典型的事例。20世纪50年代,全国讨论《琵琶记》,声势甚为浩大。对《琵琶记》的评价问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肯定派,认为《琵琶记》是部现实主义的有高度人民性的进步作品,因此作者高明是位伟大而杰出的作家。另一种是否定派,认为《琵琶记》是反现实主义的充满封建说教的落后的作品,作者立场错误,甚至反动。这场讨论,是中国南戏研究史上规模空前的一场大讨论。1956年夏天在北京邀集了160多位专家及文艺、新闻等各界人士讨论了很长时间,影响所及,几成一场全国性的运动。^③不同观点的双方争论不休,而彼此所根据的剧本多是汲古阁刊《六十种

① 该文中译本(宋耕译),发表于《文艺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2001年第3期,第97~106页。

② 孙楷第:《元曲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4页。

③ 详细参阅《剧本》月刊社编辑《琵琶记讨论专刊》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